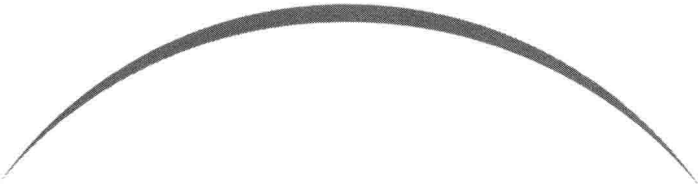




语言游戏的语用维度

范秀英◎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语言游戏的语用维度

范秀英◎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游戏的语用维度 / 范秀英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161 - 3778 - 9

I. ①语… II. ①范… III. ①维特根斯坦, L(1889 ~ 1951) — 语言哲学
IV. ①B561.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348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特约编辑 胡国秀等
责任编辑 陈 彪
责任校对 李 楠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中印集团数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75
插 页 2
字 数 252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维特根斯坦哲学对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所给予的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他是当代西方哲学最有影响的、最重要的哲学家，也是当代分析哲学的首创者之一。其早期哲学从根本上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于欧洲的逻辑原子理论和逻辑实证主义；其后期哲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兴起的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又给予了决定性的影响。

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哲学家，尽管由于逻辑实证主义在近 20 年分析哲学的发展中所出现的衰落，使得人们开始怀疑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思想的力量；而日常语言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推崇，也使得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魅力大减，但这一切都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维特根斯坦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也不能抹去维特根斯坦哲学曾给予哲学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曾有学者评价认为，维特根斯坦哲学预示了传统西方哲学的终结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也许现在将维特根斯坦与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相提并论尚为时过早，但维特根斯坦作为现代西方哲学——逻辑语言分析和日常语言分析两种哲学思潮的奠基人，其哲学以独特的反传统性和开创性的双重品格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以及未来哲学发展所给予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现代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而开放的世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世界一体化。随着国际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已成为一个时代课题。而现代西方哲学作为其文化的一部分，是西方文化的灵魂，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将有助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促进。而深入研究维特根斯坦哲学，将有助于我们把握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脉络和趋势。与其说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独创性给我们构建了什么理论，毋宁说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启示。走近维特根斯坦，了解维特根斯坦，研究维特根斯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将具有重大意义。

前后期维特根斯坦都关心语言，但前期的维特根斯坦所关心的是语言的逻辑分析和逻辑结构；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所关心的则是语言的使用和践行语言的基础。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是一种活动，或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从语言与人类生活、人的活动紧密相连的视角考察语言，使得语言不再是静止不动的指称、僵死不变的符号，而是生活中活生生的有生命的语言，是动态中的语言，是有根基的语言。而活动就是语言使用的活动，语言游戏就根植于生活形式。正是人使用语言的活动赋予语言以生命、以灵魂、以意义。语言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不仅在于它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是根源于生活实践的，而且在于其生命和活力也来自于实践，更在于其规则和意义皆来自于实践。而生活形式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先在的、必须接受的、被给予的、别无选择的。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学习、训练和教育，任何活动都是在生活形式的基础上发生的。所以，“理解一种语言意味着掌握一门技术。”适应生活形式，亦即学会生活，懂得生活；掌握一门技术，也就是掌握一种生活形式，在不同的生活形式中学会适应，并能适应生活形式的变化。

维特根斯坦立足语言实践，提出了其践行的语言规则论——参与，强调遵守规则只能在语言游戏中实现。如果脱离语言游戏的实践活动，抽象地、孤立地、静态地谈论规则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规则与理由的对峙；如果将语言游戏与规则分离，到游戏之外找规则，就会陷入遵守规则的悖论。那么，要避免规则与理由的对峙，消解规则悖论，只有一条途径：训练与参与，即在参与语言游戏中感受规则，在训练和教育中理解规则，在活动和实践中遵守规则。

意义是语言的灵魂，没有意义的语言是难以想象的。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改变了对问题的提问方式，由以往的“什么是意义？”变成了“什么是意义的说明？”这一变换就使逻辑问题变成了实际问题，就把人们从寻找意义的对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用“用法”替代了“指称”。“意义即用法”引导着语言哲学由理想语言、逻辑语言回归到日常语言、生活实践，冲出了由语言的逻辑结构为其确定意义的囚笼，突出强调了语境的具体特定性及使用方式的差别性对于意义的规定性，这样，人们对语言意义的研究也由静态走向了动态。语言是具体的、多样的、可变的，语言的意义也是具体的、多样的、可变的；而语言的每一次不同的使用，都会产生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不仅仅是由于语境的不同，更在于使用者使用方

式的差别。因此，理解语言的意义不是通过定义的方式或解释说明的方式，而是要深入生活，参与游戏。语言不仅为我们划定了生活的世界，也向我们“显示”了生活的意义。由此，“意义”与“语言”不再是一种外在的关系，而是一种内在的关系，意义不存在于语言游戏之外，而是存在于语言游戏之中，只有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才能理解意义。意义之于语言，就如同规则之于游戏；游戏必有规则，语言必有意义；规则不外在于游戏，意义不外在于语言；遵守规则是一种实践，意义就在于语言游戏中的用法。维特根斯坦后期所关心的就是语言的使用——语言实践。

“实践”概念自古希腊哲学以来一直是哲学上的重要概念，特别是近现代，更多地吸引了哲学家们的注意力。“实践”一般被用以指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活动。而维特根斯坦的实践概念则有别于传统，他把实践归结为语言游戏。

通常理解的“实践”是与“理论”相对的范畴，而维特根斯坦立足于语言游戏，转换了一个新的视角，赋予了“实践”以新的内涵。维特根斯坦指出：“我可以说，语言是基于一种生活方式。为了描述这种语言现象，我们就必须描述任何一种实践，但不是孤立的事件。”“只有在实践中词才会有意义。只有在语言的实践中。”“如果你看到这个词在语言的用法中所起的作用，我是指在整个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游戏也就是整个的语言实践，人类使用语言这一基本活动就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而这种使用语言的实践活动也就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人，正是由于使用语言而成为人。人之所以被赞为“制作者”，被誉为“理性者”，被称为“游戏者”，正在于人为“语言者”。所以，维特根斯坦的实践指的是人类特有的使用语言的社会活动。他在强调实践活动性的同时，突出了实践的语言性及语言的使用者。

语言游戏是人做的，人是语言游戏的游戏者，是游戏的参与者；语言怎样被使用，什么人在使用，在什么语境下使用，都是语言意义的相关因素。所以，语言游戏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就是人的存在状态，其根本特征就在于践行，而生活形式就是语言游戏别无选择的基础。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思想的转变，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正是其思维方式的转变，才使其从理想语言转向语言实践。思维方式也就是观察事物的方式，对待事物的态度。维特根斯坦后期所力图给予我们的就是一种方法。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我想要你去做，不是

在个别观点上同意我的意见，而是以正确的方式研究问题。”“我想要教你的不是意见而是一种方法。”应该说，观察事物的方式或方法，比观察本身更为重要，更为根本。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不仅是其个人思维方式的转变，也是对整个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否定。而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其对语言游戏的动态观察取代了对语言的静态分析，而其所倡导的动态观察实际就是无须任何理论分析和反思的语言实践。理解，是一种使用语言的活动，在语言活动中才能实现。语言从人类生活的实践中产生，也应该在人类的生活实践中加以理解。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是多彩的。维特根斯坦立足生活，注重行动，强调使用，鼓励践行，意在引导人们关注生活、关注社会、关注语言、关注活动。语言是生活中的语言，生活是语言中的生活，践行语言的根基在生活。因此，不要追寻那形而上的东西，那是皇帝的新装；不要热衷于那玄思空想，那是枉费心机；不要再在那灰色的天空下沉浮，那寻不到根基。让你的双脚踏上那粗糙的地面吧，那是坚实的，足以为你奠基；置身于多彩的生活世界，回归生活，回归现实，语言会获得活力，游戏会更精彩。生活因智慧而灵光，社会因创造而多彩，世界因语言而生动。

与其说维特根斯坦消解了哲学，宣告了哲学的终结，毋宁说他在哲学这座语言的迷宫中为后人树起了警示的路标，希望后人免于误入歧途，指引后人走上正确之路——践行语言，回归生活。

目 录

前言	(1)
引言	(1)
第一章 导论	(2)
一 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	(11)
(一) 从哲学发展的角度看“语言转向”	(14)
(二) 从哲学与科学关系角度看“语言转向”	(17)
二 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的发展	(21)
(一) 语言分析哲学传统	(22)
(二) 现象学——解释学传统	(24)
三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转向”	(24)
(一) 思想渊源	(24)
(二) 思想转变	(27)
四 语言游戏论对当代西方哲学的影响	(32)
(一) 语言游戏论在维氏哲学中的地位	(32)
(二) 语言游戏论对当代西方哲学的影响	(36)
五 语言游戏论与语用学	(43)
第二章 语用学的哲学观——践行语言	(48)
一 哲学问题的语用学诠释	(48)
(一) 哲学之困境	(48)
(二) 哲学之诊断——误用语言 歧途迷路	(50)
(三) 哲学之治疗——对症下药 重在语用	(54)

(四) 哲学之康复——参与游戏 践行语言	(58)
二 反叛本质主义	(61)
(一) 批判的武器——语用	(61)
(二) 世界无本质	(65)
(三) 语言无本质	(67)
三 语言的生活世界	(71)
(一) 关于家族相似性	(71)
(二) 家族相似性的思考	(75)
第三章 语用的基础——生活形式	(78)
一 语言是一种实践活动	(78)
(一) 游戏的哲学诠释——语言游戏	(78)
(二) 语言游戏的语用学特征	(82)
二 语言游戏的根基	(86)
(一) 世界图式	(86)
(二) 生活形式	(89)
(三) 语用的基础	(91)
第四章 语用学的规则论——参与	(98)
一 规则与游戏	(99)
(一) 何以消解悖论	(99)
(二) 何需理由	(102)
(三) 何以游戏	(106)
二 规则与理解	(108)
(一) 理解与使用	(109)
(二) 理解与遵守	(111)
(三) 理解与约定	(113)
三 规则与意义	(115)
(一) 一种规约 两种视角	(116)
(二) 两种规则 两种层次	(117)
(三) 得当与否的语用标准	(118)
(四) 两种判据 两种一致	(119)

第五章 语用学的意义说——使用	(121)
一 指称与意义	(122)
(一) 图式	(122)
(二) 投影	(123)
(三) 界限	(124)
(四) 批判	(128)
二 工具与意义	(130)
(一) 工具具有功能性	(131)
(二) 工具具有多样性	(131)
(三) 功能在操作中显现	(132)
三 语境与意义	(132)
(一) 语境的具体性	(133)
(二) 语境的多样性	(134)
(三) 关于整体语境	(134)
四 使用与意义	(135)
第六章 语用学的维度——语言游戏之思	(140)
一 哲学自循环：不可消解的自我追思	(140)
(一) 不可消解的	(140)
(二) 未完成的	(141)
(三) 时代性的	(143)
(四) 非一致性的	(145)
(五) 并非循环的	(147)
二 文化之思	(149)
(一) 人的文化性	(149)
(二) 文化的多元性	(151)
三 思维方式之转换——中介化	(152)
(一) 关于思维方式	(152)
(二) 思维方式与哲学变革	(154)
(三) 中介化的转向	(156)
四 语言游戏的方法论之思	(164)

(一) 只用描述 避免说明	(164)
(二) 只要具体 无须思辨	(165)
(三) 强调概观 拒绝割离	(166)
(四) 注重动态 放弃静观	(167)
五 哲学语用学之构想	(168)
(一) 关于哲学之“问题”	(168)
(二) 关于语境的理解	(180)
(三) 关于语言的理解	(181)
(四) 关于语言实践与语用者	(184)
结束语	(190)
参考书目	(193)
附录	
一 维特根斯坦生平年表	(199)
二 维特根斯坦主要著作索引	(206)
三 论文中所引著作缩写	(208)
后 记	(209)

引 言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乃为思想的动物。”

亦如马克思所言：“人的生命是有意识的。”

正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不是神创造的，人方为万物之灵。

人既是“制造者”，又是“理性者”；

既是“游戏者”，又是“语言者”。

人类世界不仅需要实践家，而且需要思想家。

人为理性者，人思故人在，我思故我在；

人为语言者，人语故人在，我语故我在。

思你所疑的，语你所思的，而行动才是语言游戏的根基。

“‘我知道’经常表示这样的意思：我有正当的理由支持我说的语句。”

“人们在准备好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时才说‘我知道……’”。

“哲学必须为可思想的东西划一条界线，从而为不可思想的东西划一条界线。”

哲学必须经过可思想的东西从内部限制不可思想的东西。

它表示什么是不可说的，同时清楚地显示什么是可说的。

凡是能够说的东西，都能够说清楚。

凡是不能够说的东西，就应该保持沉默。

第一章 导论

语言是人类的重要标志。20 世纪 90 年代牛津大学威廉信托人类遗传学中心及伦敦儿童健康研究所的科学家对一个患有罕见遗传病的家族中的三代人进行了长期观察和跟踪研究，发现这个家族的 24 名成员中约有半数无法自主控制嘴唇和舌头，阅读存在障碍，而且无法记住词汇，不能理解和运用语法，难以组织句子。研究者把这个家族称为“KE 家族”。研究者推测，一定存在有某种决定着人的语言能力的遗传基因，由于它出现了问题才会导致人的语言缺陷，科学家把这个基因称作“语法基因”，也称为“KE 基因”。几年后一个与“KE 家族”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的英国男孩“CS”也患上了类似疾病，通过两者的基因对比，研究者发现，是第七染色体当中的一个基因——“FOXP2”基因遭到破坏造成的，科学家称之为语言基因。这一科学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语言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遗传的结果，是人所特有的。希腊人把人定义为“会说话的动物”，应该说不无道理。每个人从其婴儿时期开始就凭借遗传人类所特有的天赋，学习和使用语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因为语言，人类有别于世界的其他动物；因为语言，人与人之间实现了沟通、交流；因为语言，人类的全部精神财富得以保留传世。语言之于人类的重要意义从远古时代人们对语言的崇拜就可略见一斑。很多民族把语言作为一种可以显灵的咒语使用，如起誓发愿、毒誓、祝福语等，都足以反映人们对语言神力的敬畏；有人甚至赋予语言以创世之功，如《约翰福音》一书即以“太初有言”开篇；英国哲学家罗素（B. Russell，1872—1970 年）在《人类的知识》一书中说：“语言也像呼吸、血液、性别和闪电一样，从人类能够记录思想开始，人们就一直用迷信的眼光来看待它。野蛮人害怕把真名泄露给敌人，唯恐敌人借以施展邪术。奥里金告诉我们，异教的巫师用圣名耶和华比用宙斯·奥西里斯或婆罗门等名字受到的法力更大。”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

tos, 约公元前 540—前 480 年) 认为, 只有语言才是代表多变世界中之恒定的“逻各斯”的东西。“逻各斯”——“Logos”, 其词语根“leg-”的本义是“说、讲”之意, 即语言。被视为德国文化史上影响最深刻和最伟大人物之一的威廉·冯·洪堡(Friedrich Wilhelm Christian Carl Ferdinand von Humboldt, 1767 年 6 月 22 日—1835 年 4 月 8 日) 认为,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特征, “语言是人类情绪的摇篮、家乡和住地, 因此在语言里包含和隐藏着人类的情绪。”洪堡是最早提出“语言左右思想”学说的学者之一, 他认为, 人与人之间要交换复杂的思想, 就必须借助或通过共同的语言; 语言也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和媒体, “理解不是不可分割的点与点之间的接触, 而是不同人的思想圈之间的部分重叠。这样才会有人类的思想进步, 每个思想的扩展可以进入到另一个人的思想圈内, 而同时又不会束缚另一个的思想。对思想的束缚只会导致反感。这是思想扩展的必需条件。”洪堡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区别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提出: “语言是世界观”, “每一个人, 不管操什么语言, 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世界观的承担者。世界观本身的形成要通过语言这一手段才能实现……每种语言中都会有各自的世界观”, “语言是一个民族人民的精神, 一个民族人民的精神就是其语言”。自古以来, 语言就吸引着无数知反省、尚反思、善思辨的人们的目光和注意力, 也许正如柏拉图(Plato, 公元前 427—前 347 年) 所说: “语言这个题目是所有题目中最重大的一个。”

在一定意义上说, 语言哲学思想自有语言之时即已存在。

中国哲学对语言的探求始于对“名”的反思。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思想极其丰富精深, 在被冠以“群经之首”的《周易》及《诗》等经典古籍中就有所体现。如“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的思想, 这是对语言意义和语境的探究; “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则对“言—象—意”关系进行了研究。春秋战国时期, 社会动荡不安, “奇辞起, 名实乱”, “诸侯异政, 百家异说”、“名实相怨”, 从而引起诸子百家对语言问题的关注, 以至于使语言哲学成为先秦的“显学”。诸子百家从不同的立场、视角,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观点。

“名实之辩”始于孔子和老子。孔子沿着循名责实之径, 提出了“正名”之主张。孔子从言与德、言与行、言与礼、言与政的关系切入语言问题, 注重语言的功效, 注重人我心意的沟通, 注重语言表达的文质相彰, 提出善言者要因人而言, 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重人道并以人道顺乎天道的

语言哲学思想。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正名思想，强调名的规范功能，并把孔子的正名思想从“正政”之说发展为“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方淫辞”（《孟子·滕文公下》），认为正名、正政的工夫肇始于“正人心”。孟子关注到了语言与环境、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触及语言与存在的关系，提出了“言无实不祥”、“言近而指远”（《孟子·离娄下》）的思想，通过论证“知言”、“知道”、“养气”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从而把语言哲学与人格修养联系起来，凸显了孟子语言哲学的道德实用价值。由于儒家孔子和孟子的正名思想是以伦理政治为旨趣，侧重语言与道德的关系，注重语言的道德功能，因此，我国学界有学者称之为“德行派”。

老子和庄子语言哲学思想的重心则在本体论和认识论领域。《道德经》开宗明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德经·第一章》）。庄子在承继老子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道与言的关系，在充分肯定“道”存在的前提下，又断言“道”无形、无象、无声、无为、无名，指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无形乎！道不当名。”（《庄子·知北游》）老庄在阐述语言与世界本体关系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探讨了语言的认识功能。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第八十一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第五十六章》），“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第五章》），老子看到了语言的局限性，但也由此而否认了语言的认识功能。庄子与老子有别，他在充分肯定语言的功能和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了语言认知功能的有限性、不确定性和片面性，认为：“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轂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庄子·齐物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

墨家和名家则从逻辑的角度对语言本身进行了深入研究。墨子对逻辑问题的思考是从对老子的无名与孔子的正名思想辨析开始的。墨子第一次提出了“辩”、“故”、“本”、“原”、“用”等逻辑概念，第一次把人的理性思维逻辑化、公理化，在试图解决名实不符问题的过程中阐发了名实关

系、名取关系和言意关系，并提出了辨别语言真伪、善恶、当否的标准；主张取实予名，认为仅仅知道名是远远不够的，“名”是由其所指的“实”得来的，“今瞽曰：‘钜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同时认为：“言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墨子·非命上第三十九》）“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寻焉，忘名忽焉，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墨子·修身》）“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墨子·非命中》）“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墨子·贵义》）“举，拟实也”，“信，言合于意也”，“言，出举也”，“言，口之利也”（《墨子·经上》）。

名家思想的开山鼻祖、战国时代“名辩”思潮中的思想巨子惠子与博学善辩的公孙龙共同将名辩学说推向顶峰。“名家”与其他诸子百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正名实”的方法。名家主要是以逻辑原理来分析事物，辩论的内容主要集中于那些与政治人伦事务无关的纯哲学问题。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纷乱里，对纠正当时名实混乱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他们注重分析名词概念，始终以“名”为研究对象。惠子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和不断变化，认为一切事物都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正如“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公孙龙是“离坚白”学派的主要代表，在其著名的诡辩学代表作《公孙龙子》中，主要研究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逻辑学中的“个别”与“一般”以及事物的共性与个性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惠子和公孙龙分别代表名家的两个基本派别，其思想差别主要体现在“合同异”说中。惠子倾向于合万物之异（合异同），强调事物的“同一”（即同）

的一方面；公孙龙则倾向于离万物之同（“离坚”），强调事物的差别（即“异”）的一方面。惠子强调“实”是相对的、变化的；公孙龙强调“名”是绝对的、不变的。他们在各自所强调的方面都有精辟的思想。公孙龙完全脱离感性认识，只强调概念的逻辑分析，具有十分浓厚的形而上学特色，但在逻辑学上，他的贡献是值得重视的；公孙龙的论证在逻辑上和概念分析上其观点运思深刻独到，只是他把一些概念混淆而流入诡辩。在《白马论》中公孙龙分析了“马”与“白马”这两个概念的差别，但是，他夸大了这种差别，把两者完全割裂开来，并加以绝对化，认为共相是一种独立存在，最后达到否认个别，只承认一般，使一般脱离个别独立存在。

总之，中国先秦语言哲学是在当时“名实相怨”社会背景下提出的思想主张，关注的都是社会现实问题，是对现实的回应，立言宗旨都是围绕名实关系展开的，不论是儒家的“循名责实”，法家的“综核名实”，还是墨家的“以名举实”，都体现了先秦哲学追求名实相符的根本态度及伦理本位；各派所主张的妄言、不言、无言、去言、谨言、慎言思想均体现了中国哲学追求“舍筏登岸，见月忽指”的超然境界，以及追求超越语言而直接指向意义的道德归宿和人文宗旨。这和西方 20 世纪哲学语言学转向以来的某些流派颇有不同，西方的某些语言哲学挟后现代之风尚，不是希望跨过语言寻找意义，而恰恰相反，是要解构意义，关注语言。先秦语言哲学对秦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正如塞尔所言：语言哲学“与哲学一样古老”^①，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所讨论的问题，几乎都与语言有关，语言与哲学一直就有不解之缘。哲学发展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追求获得具体的语言使用环境，并通过引入语言分析方法发展其自身的思辨思维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却摆脱了其单纯的工具性而逐步获得了本体地位，成为显学。

逻各斯一直是西方哲学探究的中心课题，由于原则上几乎无法用一个确定的词汇对逻各斯——Logos 作出精确的翻译，因此大多采取直接音译的方法，把“Logos”音译为“逻各斯”。希腊文 λογος 这个词本来就有多种含义，总体来说，它大致有语言、言谈、思考、公式、公理、论证、尺度、说明、比例之意。在最早将这个概念引入哲学的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

^① 参见 Searle, J. R., *Philosophy of Language*, Oxford Press, 1971, p. 1.